

审讯者审讯态度和审讯策略以及被审讯者人格特质对虚假供述的影响探究

苏佳豪¹ 张璇²

(^{1,2}西南大学心理学部, 重庆 400715 通信作者: 张璇 zhangxuanjlu@163.com)

摘要: 虚假供述是法律程序中误解嫌疑人并导致冤假错案的主要原因之一, 它的产生是情境因素和个体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情境因素包括审讯者审讯态度和审讯策略; 个体因素包括被审讯者人格特质(易受暗示性和依从性)。因此, 本研究探讨了审讯者审讯态度和审讯策略以及被审讯者人格特质对虚假供述的影响。采取2(审讯者审讯态度: 友好 & 严肃) × 3(审讯者审讯策略: 显性 FEP & 隐性 FEP & 无 FEP) 完全随机实验设计, 并在实验结束后测量被试的人格特质(易受暗示性、依从性)。在西南大学在校生 120 人中开展实验研究, 男 28 人, 女 92 人, 结果发现: (1) 审讯者审讯态度对虚假供述的影响不显著; 审讯者审讯策略对虚假供述的产生有显著影响; 无论使用任何审讯策略, 都比不使用审讯策略, 更容易引发虚假供述, 其中隐性 FEP 比显性 FEP 诱发出更多的虚假供述; (2) 在被审讯者人格特质中, 易受暗示性对虚假供述的影响显著, 被审讯者易受暗示性程度越高, 更容易产生虚假供述; 而依从性对虚假供述没有显著影响。此外, 本研究还调查了被试的坦白压力, 结果发现, 做出虚假供述的被试比未做出虚假供述的被试有更高的坦白压力。

关键词: 审讯态度; 审讯策略; 人格特质; 虚假供述

1 引言

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推进,刑事司法领域的冤假错案逐渐引起党的重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也重点论述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严格公正司法。刑事司法系统的功能就是惩罚罪犯,伸张正义。如果出现冤假错案不仅会侵犯公民的人权,还会使法律的公信力与权威性丧失。已有研究表明,虚假供述是法律程序中误解嫌疑人并导致错误定罪的一大主要原因(Leo, 2009)。据统计,被审讯者在审讯阶段的认罪率超过 90% (刘方权, 2007), 而我国每年一审认定有罪的被告人有将近一百万人, 哪怕法院采信虚假供述的可能性只有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 也难免会造成很多的冤假错案(李昌盛, 2015)。因此, 在审讯中避免虚假供述的产生, 维护司法公正, 审讯者了解引起虚假供述的因素是很有必要的。

1.1 虚假供述的涵义

Ayling(1984)将虚假供述定义为无罪者的错供行为和有罪者的谎供行为, 这是广义的虚假供述的涵义, 狭义的虚假供述仅指无罪者的错供行为。陈欢、罗大华、薛雄庭等人(2012)认为, 虚假供述是指供述者对自己从未实施的某项犯罪行为进行供认。Gudjonsson(2003)认为虚假供述最严格的标准就是绝对的无辜者对罪行的供认不讳。根据以上定义方式, 笔者认为虚假供述就是被审讯者承认自己没有犯过的罪行。本文对虚假供述进行限缩解释, 采用狭义的虚假供述的定义, 即无辜的人承认自己未犯过的罪行。

1.2 虚假供述的分类

Kassin 和 Wrightsman(1985)将虚假供述分为 3 类。

第一种是自愿型虚假供述, 是在无审讯压力的情况下承认自己未做过的行为。个体可能因满足自尊需要, 通过承认罪行出恶名而获得关注与威信; 也可能是满足情感与归属需要, 在审讯中为保护重要伙伴而冒名顶替, 这样的情况在未成年人中最为常见, 同伴间的忠诚或许是未成年人强大的自愿供述动力(赵雪莲, 2021)。

第二种是顺从型虚假供述, 即被审讯者面临外部强制的压力(审讯时所使用的各种审讯策略)和内部压力(个体的脆弱性), 考虑到自己坦白的短期收益(结束审讯、获得解脱)似乎高于不坦白的长期收益, 于是在保持无罪信念的情况下, 作出承认自己有罪的虚假供述(赵雪莲, 2021; Paton 等人, 2018)。

第三种是内化型虚假供述, 与顺从型虚假供述不同的是, 内化型虚假供述是被审讯者将有罪信念内化, 更有甚者会内化出一段自己犯罪的记忆, 认为自己确实做出了违法犯罪行为, 尽管这种信念内化可能只是暂时的(Kassin 等人, 2010)。内化型虚假供述的形成受个体脆弱性因素和情境因素共同影响。个体的脆弱性因素包括个体的易受暗示性、顺从性、记忆不信任、想象和虚构倾向, 而审讯策略、孤立隔离等情境性因素可导致个体产生记忆不信任, 通过个体脆弱性因素改写个体的信念, 从而内化出有罪信念(赵雪莲, 2021)。

1.3 虚假供述的影响因素

Gudjonsson(2010)认为虚假供述是情境因素和个体因素（脆弱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情境因素主要是与审讯者有关的因素，比如针对被审讯者的审讯策略（出示伪证、最小化、最大化）、强硬的态度、剥夺被审讯者的睡眠以及审讯者的有罪推定。本文关注审讯策略与审讯态度这两种情境因素。个体因素是指与身心健康有关的脆弱性，心理脆弱性包括易受暗示性、依从性、反社会人格特征或其他心理障碍（例如，抑郁、焦虑）。由于心理脆弱性过多，本文只关注更为具体的心理脆弱性，易受暗示性和依从性。（Gudjonsson, 2010）。

1.3.1 情境因素

在审讯中，审讯者会通过使用审讯策略来尽可能多的获得供词。虽然使用审讯策略可以让有罪的被审讯者说出真相，但同时也会增加无辜的被审讯者作出虚假供述的风险（Drizin & Leo, 2004）。审讯态度也会影响到对虚假供述的诱导，Paton 等人（2018）的研究结果虽然未表明在友好的审讯者条件下，比在严厉的审讯者条件下可以诱发更多的虚假供述，但不同的审讯态度和审讯策略的组合运用对虚假供述的诱发有不同的影响（Paton.等人,2018）。因此，在使用审讯策略时运用正确的审讯态度可以获得更多有用的供词，但使用审讯策略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有效地获得被审讯者的真实供词，同时又避免诱导出被审讯者的虚假供述。由此，本文欲研究审讯态度和审讯策略对虚假供述的影响以初步探讨如何解决上述问题。

1.3.1.1 审讯策略

由于有众多审讯策略，本文只研究其中一种审讯策略：提供虚假证据（False-evidence ploys, FEP）。FEP 为描述或实际伪造证据的一种审讯策略，分为显性 FEP 与隐性 FEP。Gudjonsson 认为虚假的指控可能是虚假供述的主要因素（Gudjonsson, 2003）。Kassin 等人比较了 FEP 条件（即显性 FEP 和隐性 FEP）和非 FEP 条件，发现在使用 FEP 之后明显有更多的虚假供述(Kassin,2011)。这些发现与实际案例中使用 FEP 相似，FEP 在绝大多数记录在案的警方诱导的虚假供述中都有牵连(Kassin, 2010)。由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审讯人员执行 FEP，可能会引出被审讯者更多的虚假供述。

显性 FEP 即直接提供虚假证据进行指控。当被审讯者对自己记忆不信任时，直接提供虚假证据会进一步加深对自己的怀疑。但 Inbau 等人(2001)和 Jayne 和 Buckley(1999)建议审讯者对显性 FEP 要谨慎使用，因为使用显性 FEP 可能会适得其反，毁掉审讯。例如，如果有罪的被审讯者知道自己步行逃离现场，一份涉及驾车逃跑的被审讯者的明确证词（显性 FEP）将会摧毁审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Inbau 等人(2001)和 Jayne、Buckley(1999)建议使用隐性 FEP，他们认为这种策略比显性 FEP 更具欺骗性。

Inbau(2001)和 Jayne and Buckley(1999)将隐性 FEP 称为诱饵问题。诱饵问题在本质上是非指控性的，但同时向被试展示了一些证据存在的似是而非的可能性，这些证据将他牵连到犯罪中。Jayne 和 Buckley(1999)认为，隐性 FEP 的使用成功地区分了有罪被审讯者和无辜被审讯者。Jayne 和 Buckley(1999)提出了四步使用隐性 FEP 的指导方针。首先，他们建议调查

人员在被审讯者做出相关否认后使用隐性 FEP。第二，审讯者必须提出隐含的 FEP，就好像证据可能存在一样(Inbau 等人，2001)。第三，在可能的情况下，审讯人员应提出证据，就好像证据将会存在(例如，一旦调查人员到达现场)，或就好像证据目前存在，但将在不久的将来进行检验。第四，如果可能的话，调查人员应该为证据的存在提出一个无罪的理由，这样被审讯者就会被邀请改变他或她的故事。Perillo 和 Kassir(2011)使用电脑死机范式的研究表明显性 FEP 条件和隐性 FEP 条件与对照条件相比增加了虚假供述率，但未发现显性 FEP 和隐性 FEP 条件虚假供述率有显著差异于是提出本研究假设 1：显性 FEP 条件和隐性 FEP 条件与对照条件相比显著增加坦白压力和虚假供述率。

1.3.1.2 审讯态度

除审讯策略可以影响虚假供述的产生以外，审讯者的态度也可能影响被试作出虚假供述(Baxter, Jackson, & Bain, 2003)。如果采用咄咄逼人的审讯态度，即使是无意的，也可能施加更多的压力(Baxter, 2004)，这种巨大的外部压力可能会使无罪被审讯者认罪，因为他们相信不认罪将会得到更严重的惩罚(Malloy 等人，2014)。审讯者咄咄逼人的态度可能会引起被审讯者的焦虑和无力感，从而增加审讯者和被审讯者之间的心理距离。指控式的审讯方式既降低了被审讯者的自信，又不能使其证明自己的清白，这也可能导致虚假供述(Leo, 2009)。Paton 等人(2018)的研究虽然并未得到态度严厉和态度友好的条件下被审讯者的虚假供述率有显著差异的结果，但有必要通过实证来检验审讯者的态度是否会引起虚假供述。于是提出假设 2：与友好的条件相比，严肃的条件会引发更强的坦白压力和更多的虚假供述。

1.3.2 个体因素

Gudjonsson 出现现实监控框架来研究易受暗示性、依从性与虚假供述的关系，现实监控框架是指人们决定记忆是来自内部来源(想象)还是来自外部来源(感知)。其基本原则是，当记忆表征包含大量的细节，人们很可能会将记忆归因于外部来源。反之，当一个表征很宽泛，记忆很可能被归因于一个内部来源。显然，记忆的内外源的混淆与虚假供述有关，尤其是内化型虚假供述(Gudjonsson,1999)。

与现实监控框架相关的一个特质是易受暗示性，易受暗示性是指人们倾向于默认外部暗示，并随后在他们的记忆报告中纳入这一误导性信息(Gudjonsson,1997)。易受暗示性和虚假招供之间的联系有着悠久的历史，即暗示性个体更容易受到外部暗示的影响，这可能使他们容易发生虚假招供(Otgaar,2021)。Gudjonsson(2010)认为高水平的易受暗示性会使被审讯者容易受到各种类型的虚假证据的影响从而虚构出错误记忆，进而出现内化型虚假供述(Gudjonsson, 2010)。

与现实监控错误相关的另一个特质是依从性，依从性是人们在知道正确答案的情况下，仍然接受诱导性问题的程度(Gudjonsson,1989)。与易受暗示性一样，当人们依从性高时，在

某些情况下会出现现实监控困难,导致记忆的内外源混淆(Levy & Gudjonsson, 2010)。Stewart 等人(2018)通过元分析发现高水平的易受暗示性以及高水平的依从性会使被审讯者报告出更多的虚假供述,根据其诱发环境的不同程度不同。因此提出实验假设 3: 高水平的易受暗示性与依从性会显著影响被审讯者的虚假供述。

综上所述,特定的审讯策略和审讯态度会对被审讯者造成不利影响,并导致虚假供述。高水平的易受暗示性和依从性的被审讯者会更容易接受各种类型的虚假供述。因此,本文欲探究审讯者审讯策略、审讯者审讯态度和被审讯者人格特质对虚假供述的综合影响。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在西南大学中随机选取 120 名学生,男 28 人,女 92 人(M=20.8, SD=1.06)。

2.2 研究设计

本研究有三个自变量:审讯者审讯态度(友好、严肃),审讯者审讯策略(显性 FEP、隐性 FEP、无 FEP),人格特质(易受暗示性、依从性),采取 2(审讯者审讯态度:友好 & 严肃) × 3(审讯者审讯策略:显性 FEP & 隐性 FEP & 无 FEP) 被试间实验设计,并测量被试的人格特质(易受暗示性、依从性)。因变量为虚假供述的次数和坦白压力。

2.3 研究材料

2.3.1 审讯者行为评定量表

该问卷参考 Bain 等人(2000)使用的方法,使用 5 点的 Likert 量表评估审讯者表现出 18 种采访者行为的程度(1=没有,5=非常)。这些行为包括:紧张、严厉、友好、理解、果断、自信、专业、坚定、尊重、积极、正式、热情、严厉、有组织、有效、权威、有能力和消极。该工具已被用于研究审讯者行为对疑问句暗示性的影响(例如, Bain & Baxter 等人,2003),被认为是测量审讯者行为感知差异的可靠方法。其克伦巴赫 α 系数为 0.815。

2.3.2 坦白感知压力量表

参考 Russano 等人(2005)使用的方法,使用 11 点 Likert 量表来评估被试经历坦白压力的程度(0=“没有压力”和 10=“极度的压力”)。该问卷只有一个题项,即让被试评价自己在审讯过程中的坦白压力。虽只有一个题项,但该工具已被应用于研究审讯者使用审讯策略对被审讯者坦白压力的影响(Russano, 2005; Paton 等人, 2018),被认为是测量被审讯者坦白压力的可靠方法。

2.3.3 Gudjonsson 易受暗示性量表中文版(GSS-1)

Gudjonsson 易受暗示性量表是目前应用最广泛、最具权威性的受暗示性的测评量表,分为 GSS-1 和 GSS-2 两种设计不同内容的量表。袁红梅等人(2012)将 GSS-1 中文版施测后发现 GSS-1 中文版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使用。GSS-1 中文版的克伦巴赫 α 系数在 0.68-0.86 之间;评价者一致性信度系数在 0.75-0.99 之间;重测信度在

0.64-0.90 之间。

在 GSS-1 中, 被试听一个短篇故事, 然后在听完故事后即刻被要求自由回忆故事并且出声报告出所记得的故事内容。50 分钟之后, 被试必须回答 20 个问题, 其中有 5 个是非误导(真正的)问题, 不包含任何误导。有 15 个是误导性的问题, 误导性在于他们会暗示某些细节, 但与故事中的叙述不同。在被试回答完问题后, 第一次填写完成后计算 15 个误导性问题的得分, 即为屈从得分 1(最高 15 分)。屈从得分指的是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暗示性的问题, 即被试在负反馈之前屈从于导向性问题的数量。随后被试还会收到一些错误答案的负反馈, 主试告诉被试在填写问卷时犯了很多错误, 并要求被试尽可能准确的重新回答该量表的 20 个问题。再次填写完后计算两个分数: 转换得分和总易受暗示性得分。转换得分(最多 20 分)指的是人们在收到反馈时改变答案的倾向, 即在负反馈之后计算被试对于所有问题的回答改变的数量。总易受暗示性(最大 35)由屈从得分和转换得分的总和计算。

2.3. 4Gudjonsson 依从性量表中文版(GCS)

该量表由 20 个判断顺从行为的真假陈述组成(例如, 当我有压力时, 我很容易向别人屈服)。接受这些符合性相关陈述的人越多, 他们的总符合性得分越高(最高得分= 20)。其克隆巴赫 α 系数为 0.88。

2.4 研究程序

被试被邀请参与一项人格特质和反应时间任务的研究。在实验开始前, 主试念 GSS-1 量表上的情境故事, 要求被试尽可能的记住最多的信息并在故事念完后出声报告出自己所记的故事内容。等被试报告完便可以开始“反应时间任务”。在“反应时间任务”的伪装下, 主试告知被试要根据屏幕上出现的字母打字, 字母以每分钟 67 个的速度显示, 但是如果按下 ALT 键电脑会进入死机状态, 同时实验数据将会被损毁。60 秒后, 电脑死机, 黑屏出现。由于最后呈现的字母一定是 X(位于 ALT 键的上方), 所以可以确定的是被试没有按下 ALT 键。主试询问被试是否按了 ALT 键, 并表现得心烦意乱。上前装作想修电脑的样子, 实际只有摁下 Ctrl+Alt+Tab 才能退出蓝屏界面。

结合 Bain 和 Baxter(2000)的审讯者态度技巧, 主试采取友好或者严厉的的态度。在友好情境中, 为了建立融洽关系并表现出热情和友好。当被试进入实验室中, 主试面带微笑并感谢他们的参与, 主试与被试保持眼神接触, 微笑, 并采取放松的姿势。在实验开始前主试会与被试闲谈拉进关系, 比如询问年级、所住园区以及到达实验室所要花费的时间等等问题。主试在实验前以一种友好的方式回应被试的发起的任何对话, 并在实验中也保持这种方式。在严肃的情境中, 为了显得正式和生硬, 主试没有微笑, 表情严肃同时保持眼神接触, 采取了自信和权威的姿态, 任何与被试的谈话都给予最低限度的回应, 只以一种严肃的方式发出指示。

电脑黑屏之后, 主试询问被试相关问题。在隐性 FEP 条件下, 主试会问例如这种问题:

“你真的没有按到吗？我们这有一台电脑会全程记录你的按键，不过现在还查看不了，只有每天晚上做完实验才能查看今天一天的数据，到时候一查便知”、“我相信你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虽然你按到 ALT 键了，但是实验要求你必须尽快的进行按键反应，在这个过程中不小心按到其实挺正常的”；在显性 FEP 的条件下，主试会强行诬陷被试问出例如这种问题：“我刚在在旁边亲眼看到你按到 Alt 键了，你还说你没有吗？”、“我刚才都看见你按了，还要否认吗？”在无 FEP 的条件下，主试会文例如以下问题：“你按到 ALT 键了吗？”、“你真的没有按到吗？你没有按到电脑为什么会黑屏？”。在提问阶段结束时，主试总结了所提供的信息，并询问被试是否还有其他需要补充的。被试收到他们的承诺书，其中包括他们的回答和声明。“我承认我按下 ALT 键”，这构成了虚假的供词。实验者要求被试在承诺书上签名，在第一次请求后拒绝签名的被试会被提示两次以上，至多三次。

主试向被试发放审讯者行为评定量表、坦白感知力量表和依从性量表（GCS），并在主试念完 GSS-1 情境故事后 50 分钟，让被试填写 Gudjonsson 易受暗示性量表(GSS-1)，在被试填写完毕后，主试告知被试他的回答错误率很高（即使完全正确），再向被试发放相同的问卷重新填写。

实验结束后主试告诉被试这些行为均是实验的必要组成部分，并告诉他们实验目的。

2.5 数据分析

使用 spss27.0 进行数据分析，对数据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单因素多变量方差分析、组间方差分析、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3 结果

3.1 审讯态度对被审讯者评定审讯行为的影响

审讯者评定行为为量表得分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进行单因子多变量分析发现在 18 中审讯者行为的评定中，有 8 个行为的评分有显著差异。其中严肃（ $F = 31.45, P < 0.001$ ）、严厉（ $F = 61.78, P < 0.001$ ）、友好（ $F = 52.71, P < 0.001$ ）、善解人意（ $F = 30.96, P < 0.001$ ）、专业（ $F = 7.67, P < 0.01$ ）、尊敬（ $F = 7.69, P < 0.01$ ）、积极（ $F = 9.92, P < 0.01$ ）、消极（ $F = 19.91, P < 0.001$ ）、热情（ $F = 26.38, P < 0.001$ ）有显著差异。表明在严肃的实验条件下，被试更认为主试更为严肃且严厉；在友好的实验条件下，被试更认为主试更为友好且善解人意。与严肃的实验条件相比，在友好条件下被试认为审讯者更为专业，更值得尊敬。

表 1 根据审讯者行为进行评分

	审讯态度				F	P
	友好		严厉			
	M	SD	M	SD		
紧张	1.87	1.02	2.05	1.03	1.43	>0.05
严厉***	1.44	0.14	3.10	0.15	61.78	<0.001
友好***	4.30	0.65	2.90	1.03	52.71	<0.001
善解人意***	4.05	0.79	2.82	1.15	30.96	<0.001

独断	1.85	1.05	2.13	1.20	2.22	>0.05
自信	3.63	0.89	3.28	1.09	2.47	>0.05
专业**	4.10	0.81	3.55	0.96	7.67	<0.01
坚定	3.85	1.08	3.65	0.74	0.94	>0.05
尊敬**	3.93	0.92	3.30	1.09	7.69	<0.01
积极**	4.03	0.89	3.25	1.28	9.91	<0.01
正式	4.00	0.88	4.05	0.99	0.06	>0.05
热情***	3.83	1.04	2.63	1.06	26.38	<0.001
严肃***	2.58	1.11	3.83	0.84	31.45	<0.001
有组织	3.75	0.90	3.85	0.80	0.28	>0.05
有效	3.98	0.92	3.88	0.85	0.25	>0.05
权威	3.55	0.96	3.72	0.91	0.74	>0.05
有能力	4.20	0.73	3.92	0.83	2.51	>0.05
消极***	1.08	0.35	1.80	0.97	19.91	<0.001

*p<0.05
**p<0.01
***p<0.001

3.2 审讯态度与审讯策略对被审讯者坦白压力的影响

每种实验条件下的坦白压力的平均评分如表 2 所示。为检验审讯态度及审讯策略对被审讯者坦白压力的感知,进行了 2(严肃、友好)×3(隐性 FEP、显性 FEP、无 FEP)的组间方差分析。审讯态度($F = 0.72, P = 0.412$)和审讯策略($F = 1.10, P = 0.367$)均不会影响坦白压力,审讯态度和审讯策略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 = 0.09, P = 0.917$)。但通过进一步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做出虚假供述的被试的坦白压力显著高于未做出虚假供述的被试($t = 2.30, P = 0.024$)。

表 2 各实验条件下坦白压力的描述性统计
审讯态度

审讯策略	友好		严肃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隐性 FEP	4.28	3.02	5.09	2.56
显性 FEP	5.36	2.51	6.21	2.11
无 FEP	3.61	1.51	5.03	2.53

3.3 审讯态度、审讯策略和被审讯者人格特质对虚假供述的影响

在每个实验条件下获得的虚假供述次数如表 2 所示。

表 2 各实验条件下的虚假供述次数

审讯态度

审讯策略	友好	严肃	总计
隐性 FEP	13	10	23
显性 FEP	6	9	15
无 FEP	2	3	5
总计	21	22	43

依据是否做出虚假供述将被试分成两组,其易受暗示性和依从性得分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3 所示。

表 3 易受暗示性和依从性得分的描述性统计

虚假供述	易受暗示性		依从性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是	14.78	4.03	10.56	3.58
否	11.42	4.46	11.68	3.25

通过二元 Logistic 回归检验审讯态度和审讯策略对被审讯者虚假供述的影响,因为审讯者审讯策略包含三个水平,所以将无 FEP 水平作为基线组与其余水平做比较;此外,审讯者审讯态度,包含两个水平,将严肃水平作为基线组与其余水平做比较。该模型正确分类了 75.6% 的虚假供述。其中两个预测因子(审讯者审讯策略、易受暗示性)对模型做出了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贡献,其结果如表 4 所示。其中隐性 FEP 对虚假供述的产生有显著影响,在审讯中使用隐性 FEP 策略获得虚假供述的概率是不使用 FEP 策略的 11.645 倍(95%置信区间是[3.079, 44.038]);显性 FEP 对虚假供述的产生也有显著影响,在审讯中使用显性 FEP 策略获得虚假供述的概率是不使用 FEP 策略的 3.939 倍(95%置信区间是[1.127, 13.761])易受暗示性也对虚假供述的产生有显著影响,易受暗示性高的被试比易受暗示性低的被试做出虚假供述的概率高 1.149 倍(95%置信区间是[1.020, 1.324])。

表 4 逻辑回归中审讯态度和审讯策略对对虚假供述的预测作用

因子	B	标准差	瓦尔德	自由度	P	Exp (B)	Exp (B) 的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审讯态度	-0.226	0.530	0.181	1	0.670	0.798	0.282	2.256
隐性 FEP vs 无 FEP	2.455	0.679	13.084	1	0.001	11.645	3.079	44.038
显性 FEP vs 无 FEP	1.371	0.638	4.614	1	0.032	3.939	1.127	13.761
易受暗示性	0.150	0.066	5.127	1	0.024	1.162	1.020	1.324
依从性	-0.032	0.079	0.001	1	0.973	0.997	0.854	1.164
常量	-3.253	1.364	5.687	1	0.017	0.039		

4 讨论

本研究首次考察审讯者的审讯态度、审讯策略及被审讯者的人格特质对虚假供述的综合影响。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尽管没有确切的证据、没有极端的压力,甚至不知道承认的后果,还是会有 35.8% 被试做出虚假供述。

4.1 审讯策略对虚假供述的影响

实验结果表明审讯策略对虚假供述影响显著,隐性 FEP 与无 FEP 条件诱发的虚假供述率有显著差异,显性 FEP 与无 FEP 条件诱发的虚假供述率有显著差异,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 (kassin, 2011)。提供虚假证据策略会减少被审讯者最初的认知资源调动,在实验中又持续消耗被审讯者的认知资源,当认知资源不足或耗尽时,被审讯者就很容易做出虚假供述 (Madon 等人, 2017)。使用隐性 FEP 明显比显性 FEP 获得的虚假供述更多,但坦白压力更小。隐性 FEP 只是给被试提供一种自己可能按到 Alt 键的可能性,当被试并不确定自己是否按下 Alt 键时,这种诱导会让被试对自己的记忆产生不信任,更有可能接受审讯者提出的可能性,从而做出虚假供述 (Gudjonsson, 2017)。直接诬陷被审讯者 (显性 FEP) 按下 Alt 键虽然会给予其更大的压力,增加否认自己未按下 Alt 键的焦虑 (Normile & Scherr, 2018),但可能会激起他们的反抗心理,并且在实验程序中会接连三次让被试在承认书上签字,这种重复性提问又会再一次激起他们的反抗,从而继续否认自己按下 Alt 键 (Paton, 2018)。

4.2 审讯态度对虚假供述的影响

严厉的审讯方式虽会比友好的审讯方式增加一定的坦白压力,但差异是不显著的,并且在严肃和友好两种实验条件下,得到的虚假供述率几乎没有差异。这与前人针对审讯态度对虚假供述的影响研究结果一致 (Paton, 2018)。从单因子多变量方差分析结果来看,友好与严肃的评分有显著差异,说明对审讯态度的操纵没有问题。在友好的条件下,被审讯者认为审讯者更友好且善解人意;在严肃的条件下,被审讯者认为审讯者更严肃且严厉。但是在友好的实验条件下的被试认为审讯者更为专业,更值得尊敬,可能的原因是被试在严肃的实验条件下会导致更多的压力,产生更多的抵触心理,增加了被审讯者与审讯者的心理距离,从而对审讯者的评定较为负面 (Baxter & Boon, 2000)。研究结果表明审讯态度对虚假供述可能没有影响,但通过观察数据发现,严肃与显性 FEP (直接强硬诬陷) 的实验条件比友好与显性 FEP (提供犯错的可能) 的实验条件诱发出更多的虚假供述,友好与隐性 FEP 的实验条件比严肃与隐性 FEP 的实验条件诱发出更多的虚假供述,不同的态度配合不同的审讯策略会诱发出不同比率的虚假供述,而这种审讯态度与审讯策略的组合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4.3 个体人格特质对虚假供述的影响

实验结果表明易受暗示性对虚假供述影响显著,依从性对虚假供述影响不显著。做出虚假供述的被试与未做出虚假供述的被试相比,有更高的易受暗示性,但只有易受暗示性有显

著差异，依从性则没有，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不太一致（otgaar, 2021）。在实验过程中，被试做出虚假供述，承认按下 Alt 键。在实验结束后询问被试发现一些做出虚假供述的被试内化了供词，并相信自己可能真的按下 Alt 键，而高水平的易受暗示性会影响到内化型虚假供述的产生。高易受暗示性的个体会难以抵抗外部的暗示压力(Henkel & Coffman, 2004)，从而增加内化虚假供词的风险。高依从性会使个体会更容易接受各种类型的虚假供述（Gudjonsson, 2018）。但在实验结果中依从性对虚假供述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推测其可能的原因是样本量过小，若增加样本量，可能会有依从性影响显著的结果。

4.4 不足之处

解释目前的结果时，应考虑以下几个因素，这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到实验结果推广到人群中的程度。第一，参加实验的被试与嫌疑人最大的不同是被试可以随时终止审讯，而且他们也不会因为做出虚假供述而承担更为长期的风险，在真正的刑事审讯中，嫌疑人如果做出虚假供述，将会承担很严重的后果。第二，被试的年龄分布较为集中，均选自在校大学生，性别比例差异过大，在推广结果时均应注意。

总之，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使用 FEP 策略会获得更多的虚假供述，其中使用隐性 FEP 策略会比显性 FEP 策略可以又发出更多的虚假供述。审讯态度的主效应不显著，但不同的审讯态度搭配不同的审讯策略获得虚假供述的次数不同，希望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的探究不同的审讯态度和审讯策略的组合方式对虚假供述的影响。人格因素中，易受暗示性对虚假供述的影响显著，但依从性对虚假供述的影响不显著。

参考文献

- 陈欢,罗大华 & 薛雄庭.(2012).虚假供述影响因素及法律控制[J].心理科学(03),669-676.
- 李昌盛.(2015).错案的轨迹:以虚假供述为中心[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6),71-81.
- 刘方权.(2007).认真对待侦查讯问——基于实证的考察[J].中国刑事法杂志(05),96-104.
- 赵雪莲.(2021).脆弱性视角下未成年人虚假供述的生成机制与阻断路径[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2),79-89.
- Ayling C J. Corroborating confession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legal safeguards against false confessions [J] *Wisconsin Law Review*,1984(4) : 1121 – 1204.
- Baxter, J. S., & Boon, J. C. W. (2000). Interrogative suggestibility: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8, 753-762 .
- Baxter, J. S., Jackson, M., & Bain, S. A. (2003). Interrogative suggestibility: Interactions between interviewees' self-esteem and interviewer styl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5, 1285-1292.
- Douglass, M. D., Bain, S. A., Cooke, D. J., & McCarthy, P. (2019). The role of self-esteem and locus-of-control in determining confession outcome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47, 292-296.
- Drizin, S. A., & Leo, R. A. (2004). The problem of false confessions in the post-DNA world. *North Carolina Law Review*, 82, 891-1008.
- Gudjonsson, G. H. (1989). Compliance in an interrogative situation: A new scal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0, 535-540.
- Gudjonsson, G. H. (1997). *The Gudjonsson suggestibility scales manual*. Psychology Press
- Gudjonsson, G. H. (2010). Psychological vulnerabilities during police interviews. Why are they important? *Legal and Criminological Psychology*, 15, 161-175.
- Gudjonsson, G., & Joyce, T. (2011). Interviewing adul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Advances in Mental Health and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5(2), 16-21.
- Gudjonsson, G. H. (2017). Memory distrust syndrome, confabulation and false confession. *Cortex*, 87, 156-165.
- Gudjonsson, G. H. (2018). *The psychology of false confessions. Forty years of science and practice*. Wiley Blackwell
- Heydon, G. (2012). Helping the police with their enquiries: Enhancing the investigative interview with linguistic research. *The Police Journal*, 85, 101-122.
- Henkel, L. A., & Coffman, K. J. (2004). Memory distortions in coerced false confessions: A source monitoring framework analysis.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18(5), 567-588.
- Inbau, F. E., Reid, J. E., Buckley, J. P., & Jayne, B. C. (2001). *Criminal interrogation and confessions* (4th ed). Gaithersburg, MD: Aspen.
- Jacobson, J. (2008). [online]. No one knows: Police responses to suspect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and learning difficulties: A review of policy and practice. London: Prison Reform Trust
- Kassin, S. M., Drizin, S. A., Grisso, T., Gudjonsson, G. H., Leo, R. A., & Redlich, A. D. (2010). Police-induced confessions: Risk factors and recommendations. *Law and Human Behavior*, 34, 3-38.
- Kassin, S. M., & Gudjonsson, G. H. (2004). The psychology of confession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issu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5, 33-67
- Kassin, S. M., & Wrightsman, L. S. (1985). Confession evidence. In S. Kassin & L. Wrightsman (Eds.), *The psychology of evidence and trial procedure* (pp. 67-94).
- Leo, R. A. (2009). False confessions: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implications.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sychiatry and the Law*, 37, 332-343
- Madon, S., Guyll, M., Yang, Y., Smalarz, L., Marschall, J., & Lannin, D. G. (2017). A biphasic process of resistance among suspects: The mobilization and decline of self-regulatory resources. *Law and Human Behavior*, 41, 159 -172
- Normile, C. J., & Scherr, K. C. (2018). Police tactics and guilt status uniquely influence suspects' physiologic reactivity and resistance to confess. *Law and Human Behavior*, 42(6), 497.
- Otgaar, H., Schell-Leugers, J. M., Howe, M. L., Vilar, A. D. L. F., Houben, S. T., & Merckelbach, H. (2021). The link between suggestibility, compliance, and false confessions: A review using experimental and field studies.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35(2), 445-455
- Paton, W., Bain, S. A., Gozna, L., Gilchrist, E., Heim, D., Gardner, E., ... & Fischer, R. (2018).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questioning technique and interviewer manner on false confessions. *Journal of Investigative Psychology and Offender Profiling*, 15(3), 335-349.
- Russano, M. B., Narchet, F. M., & Kleinman, S. M. (2014). Analysts, interpreters, and intelligence interrogations: Perceptions and insights.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28, 829-846.
- Schranz, K. N., Nesmith, B. L., Limke-McLean, A., & Vanhoy, M. (2021). I'll Confess to Be Included: Social Exclusion Predicts Likelihood of False Confession. *Journal of Police and Criminal Psychology*, 1-6.
- Stewart, J. M., Woody, W. D., & Pulos, S. (2018). The prevalence of false confessions in experimental laboratory simulations: A meta-analysis. *Behavioral Sciences & the Law*, 36(1), 12-31.
- Robert Horselenberg, Harald Merckelbach, Tom Smeets, Dirk Franssens, Gjalte-Jorn Ygram Peters, Gwenny Zeles. False confessions in the lab: Do plausibility and consequences matter?[J]. *Psychology, Crime & Law*, 2006, 12(1). 61-75
- Robert A. Nash, Kimberley A. Wade, Rebecca J. Brewer. Why do doctored images distort memory?[J].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2009, 18(3). 773-780

An Exploration of the Effects of Interrogator's Interrogation Attitude and Interrogation Tactics and Interviewee's Personality Traits on False Confessions

Su Jiahao Zhang Xuan

^{1, 2}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zhangxuan, zhangxuanjlu@163.com

Abstract: False confessions, one of the main causes of misunderstanding of suspects in legal proceedings and leading to wrongful convictions, arise as a result of a combination of situational and individual factors. Situational factors include the interrogator's interrogation attitude and interrogation strategy; individual factors include the interrogated person's personality traits (suggestibility and compliance). Therefore,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effects of interrogator interrogation attitudes and interrogation strategies as well as interviewees' personality traits on false confessions. A completely randomized experimental design was adopted with 2 (Interrogator's Interrogation Attitude: Friendly & Serious) x 3 (Interrogator's Interrogation Tactics: Explicit FEP & Implicit FEP & No FEP) x 2 (Personality Traits of the Interrogated: Susceptibility to Suggestion & Compliance), and the subjects' personality traits (Susceptibility to Suggestion and Compliance) were measured at the end of the experiment. The experimental study was conducted among 120 students enrolled in Southwest University, 28 males and 92 females, and the results found that: (1) the interrogator's interrogation attitude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false confessions; the interrogator's interrogation strategy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production of false confessions; regardless of the use of any interrogation strategy, it was more likely to trigger false confessions than no interrogation strategy, in which the implicit FEP evoked more false confessions than the explicit FEP; (2) in the case of the subjects who had been interrogated, their personality traits (suggestibility and compliance) were measured at the end of the experiment. confessions; (2) among the interrogatees' personality traits, susceptibility to suggestibility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false confessions, with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susceptibility to suggestibility of the interrogatees, the more likely they were to produce false confessions; whereas adherence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false confessions. In addition,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subjects' confession stress and found that subjects who made false confessions had higher confession stress than those who did not make false confessions.

Keywords: Interrogation attitudes; interrogation tactics; personality traits; false confessions